

中外语言文学学术文库

近现代中国 翻译思想史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Translation Thought

王秉钦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中外语言文学学术文库

近现代中国 翻译思想史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Translation Thought

王秉钦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现代中国翻译思想史 / 王秉钦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中外语言文学学术文库)

ISBN 978-7-5675-6877-8

I. ①近… II. ①王… III. ①翻译—语言学史—思想史—研究—中国—近现代 IV. ①H159-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18104号

近现代中国翻译思想史

著 者 王秉钦
策划编辑 王 焰
项目编辑 曾 睿
特约审读 汪 燕 朱莎莎 李曼铭 王磊华
责任校对 王婷婷
封面设计 金竹林 张颖婷
责任印制 张久荣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52713799 行政传真 021-52663760
客服电话 021-52717891 门市 (邮购) 电话 021-52663760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6开
印 张 20
字 数 331千字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6877-8/H.944
定 价 63.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52717891联系)



《中外语言文学学术文库》

编委会

成员：（按姓氏音序）

辜正坤 何云波 胡壮麟 黄忠廉

蒋承勇 李维屏 李宇明 梁 工

刘建军 刘宓庆 潘文国 钱冠连

沈 弘 谭慧敏 王秉钦 吴岳添

杨晓荣 杨 忠 俞理明 张德明

张绍杰



总 序

GENERAL PREFACE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中外语言文学在学术研究领域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成果。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国内中外语言文学研究领域出版的学术著作大量涌现，既有对中外语言文学宏观的理论阐释和具体的个案解读，也有对研究现状的深度分析以及对中外语言文学研究的长远展望，代表国家水平、具有学术标杆性的优秀学术精品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可喜局面。

为打造代表国家水平的优秀出版项目，推动中国学术研究的创新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依托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合作开发的“中文学术图书引文索引”（CBKCI）最新项目成果，以中外语言文学学术研究为基础，以引用因子（频次）作为遴选标准，汇聚国内该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专家学者的专著精品，打造了一套开放型的《中外语言文学学术文库》。

本文库是一套创新性与继承性兼容、权威性与学术性并重的中外语言文学原创高端学术精品丛书。该文库作者队伍以国内中外语言文学学科领域的顶尖学者、权威专家、学术中坚力量为主，所收专著是他们的代表作或代表作的最新增订版，是当前学术研究成果的佳作精华，在专业领域具有学术标杆地位。

本文库首次遴选了语言学卷、文学卷、翻译学卷共二十册。其中，语言学卷包括《新编语篇的衔接与连贯》、《中西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语言学习与教育》、《教育语言学研究在中国》、《美学语言学—语言美和言语美》和《语言的跨面研究》；文学卷主要包括《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西方文学与现代性叙事的展开》、《西方长篇小说结构模式研究》、

乎全无法，而必须重新创造）。”这句话一语破的，说出了中西翻译思想的差别：西方译论只能解决低层次的科技翻译问题，而中国译论却能解决高层次的文学翻译问题。

本书以思想为纲，提出了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十大学说；又以人物为纬，分析了几十个翻译家的理论和实践。如果要用一句古话来概括中国传统翻译思想，我想可以用孔子说过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例如严复的“信达雅说”，信是“不逾矩”，“雅”是“从心所欲”，他翻译的《天演论》第一句就是证明。鲁迅把suffer（受苦）译成“含辛茹苦”，多少也有一点“从心所欲”，不过程度比较轻，而“不逾矩”的程度更大。郭沫若把韦伯《夜》诗中的“fainter, dimmer, stiller”（更模糊，更朦胧，更安静）译为“愈近黄昏，暗愈暗，静愈静”，“从心所欲”的程度大于鲁迅。林语堂把李清照的“寻寻觅觅”译成“so dim, so dark”（如此朦胧，如此黑暗），“从心所欲”的程度大于郭沫若。傅雷把罗曼·罗兰的marcher（前进）译成“顶天立地”，那几乎是无中生有了。王佐良在谈到穆旦翻译的《唐璜》时说，穆旦的“最好的创作乃是《唐璜》”，更进一步打破了翻译和创作的界限，扩大了自由王国的领域，几乎不能算是“不逾矩”了。从严复到王佐良，可以看出中国学派翻译思想的演变。“从心所欲”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不逾矩”的范围在不断缩小。而西方的翻译思想始终停留在“等”字上，只谈“不逾矩”，不谈“从心所欲”。所以西方译论无法解决中英互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问题。

至于文化问题，则更不是西方译论所能解决的。例如李白名诗《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中国的传统文化重视家庭团圆，所以看见农历十五前后圆圆的明月，就会使离乡背井的游子思念自己的家庭。而西方只有团聚，没有团圆的概念，见到圆月并不容易联想到团圆。因此如果只按照西方的对等论去译，就不能传情达意，不能传达原诗的文化内容。而根据中国的再创作，可以把“明月光”译成“a pool（池）of light”，这就是把月光比作水了。再把“思故乡”译为“I'm drowned in homesickness”（沉浸在乡愁中），又把乡愁也比作水，这样月光和乡愁就有了联系，英文读者也更容易理解。

本书还谈到融合中西翻译思想的“多元互补论”等，那就要看新译论能否解释旧的翻译精品，产生新的翻译精品了。而本书总结了从“信达雅”到“互补论”的思想，可以说是对翻译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许渊冲



前言一

FOREWORD

中国百年译学思想探索

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20世纪是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华大地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变，推进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改变了人类的命运。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一部天翻地覆的壮丽史诗。

如同历史上一切重大变革的时代一样，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风云际会，英杰辈出的时代，正是伟大的时代，造就出灿若群星的历史伟人，也正是历史伟人的丰功伟业，才体现着历史发展潮流之所趋，人心之所向，反映着人类前进的伟大时代精神。他们中有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也有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和翻译家。他们的光辉思想，鸿才睿智，震古烁今，垂范后世，是人类永远值得珍摄的宝贵精神财富。

恩格斯曾经这样评述过文艺复兴时代：“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自然辩证法·导言》）梁启超、严复等就是维新时代产生的巨人，鲁迅、茅盾、郭沫若等就是五四时代产生的巨人，钱钟书、傅雷等就是新中国新时代产生的巨人……他们具有的“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与欧洲文艺复兴的巨人们有极大的相似性。他们的创作，他们的众多的译作，他们的精辟的理论和思想鲜明地体现了作为巨人的品格，巨人的融贯人类各种文化知识体系的能力及其思维方式。

他们是大海，可包纳百川；他们是深谷，可容汇人类一切知识。

他们之所以成为文化巨人，就在于他们具有超人的吸收、消化古今中外知识的巨大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新的不朽的精神财富。

这些20世纪百年历史造就出的杰出的翻译宗师们，他们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宏大的历史背景下，肩负着人民和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为中华民族的强盛，人类的文明，从事着艰苦卓绝的翻译大业，他们一生的杰出的翻译业绩和光辉的翻译思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从近、现代到当代翻译思想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译史研究，以人为本。”

翻译思想史研究的中心对象，正是作为人的译者，是这些在中国翻译史上具有代表性的翻译家们。他们大多不是职业翻译家，但都有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他们从事翻译活动都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因此对民族思想文化的沟通起了极大的作用，在翻译史上留下了永恒的足迹。这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特点。在这些著名的翻译家中，除了致身于翻译事业的翻译实践家和翻译理论家傅雷、朱生豪等以外，还有著名的思想家陈独秀、严复、鲁迅，哲学家艾思奇、贺麟，文学家郭沫若、茅盾、郑振铎，文论家钱钟书，文艺理论家朱光潜，文艺批评家成仿吾，语言学家赵元任、吕叔湘等，他们的参与，拓展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研究领域，加速和完善了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的进程。¹

我们在考察我国两千多年光辉灿烂的翻译史的大背景下，追溯这些翻译家们的光辉的翻译生涯，挖掘其翻译思想，深究他们的杰出的历史贡献及其在翻译领域创立的理论学说及其社会起因，探索这些学说在我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史上的演进过程，特别注意论述和总结他们的经验和对翻译的理性的闪光的思考。一言以蔽之，聚焦翻译宗师，梳理译论长轴，把握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的时代脉络，面对新世纪，促进我国现代译学思想的发展。这就是我们所遵循的研究原则，也是撰写本书的目的。

“替他们摄特写镜头。”

我所以选择这个研究课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受了王佐良先生翻译思想的影响。他曾说过，我国译论界似乎“缺乏对一个重要译者的集中研究”。他

¹ 在西方翻译史中也有同样的现象，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德里达、奎因、福柯，同时也是世界一流的哲学家，巴斯奈特、埃文·佐哈尔是著名的文化学家。

在《新时期的翻译观》中提出要集中研究有影响的翻译家的翻译思想，比如，“作为翻译家的鲁迅——他译了多少书？根据什么原本译的？译文的得失；翻译主张的由来（有什么时代背景？政治因素？文化界情况？等等），是否真的实践了自己的主张？中途有无变化、修正？对翻译界的影响；与其本人创作的关系；在当时的文化中起了什么作用？……今天的评价。也可用同样的问题来研究任何别位文学家兼翻译家。”“替他们摄特写镜头”，“要比已有的叙述做得更丰满更深刻”。于是我写了这部书，并把写作重点定在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史上。

关于中国传统翻译思想，这里“传统”不是一般的时间性概念，而是相对于“现代”的方法论概念。中国传统翻译思想，深深植根于我国悠久、丰富、灿烂的文化历史，以中国古典文论和古代哲学及古典美学为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而建立的中国（本土）翻译思想（它并不排除西方传统语言理论和传统译学理论的影响¹）。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经历了古代佛经翻译时期、近代西学翻译时期和现当代翻译时期。²（“文革”十年是一条分水岭。之前，为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时期；之后，为中国现代翻译思想发展时期。）

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史以十大学说为重要标志，即古代的“文质说”（以支谦、鸠摩罗什、玄奘为代表）³、近代的“信达雅说”（严复）、现代的“信顺说”（鲁迅）、“翻译创作论”（郭沫若）、“翻译美学论”（林语堂）、“翻译艺术论”（朱光潜）、“艺术创造性翻译论”（“意境论”）（茅盾）、“神似说”（傅雷）、“化境说”（钱钟书）、“整体（全局）

1 20世纪20年代郑振铎在《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一文中第一次引进英国泰特勒（Tyttler）在《论翻译的原则》一书中提出的“翻译的三大原则”；30年代林语堂第一次引进意大利克罗齐（Croce）的“翻译即创作”之说。

2 参见刘重德《关于建立翻译学的一些看法》一文中提出的：“‘中国传统译论’，从维祗难、道安、鸠摩罗什一直到当代从传统译论出发并运用新观点对之多少有所发展而且能自圆其说的理论家及其自成一家之言的学说均应包括在内。”（《三湘译论》，湖南出版社，1995年。）朱志瑜《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神化说’（前期）》一文中指出的：“所谓‘中国传统翻译思想’既包括从汉末到本世纪六、七十年代翻译家和学者提出的有关翻译理论与方法的论述，还指近年来发表的一些在理论上沿袭和发展古代、近代翻译思想的文章和专著。”（《中国翻译》2001年，第2期。）

3 译论中的“文质说”源于孔子的“尽善尽美”论。这是从孔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到韩非（“文为质饰”）等几代哲人的哲学—美学思想，是我国传统译论的思想源泉。

——
近现代中国翻译思想史

论”(焦菊隐)。

此十大学说思想,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构成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一条贯穿始终的长轴。

《近现代中国翻译思想史》是一部系统论述中国翻译思想发展史的著作。为叙述方便,本书依据中国历史的分期原则,将中国20世纪百年的翻译思想史分为近代、现代、当代三个时期(古代部分仅作为绪论,简要论述,以保持全书的连续性和一致性)。而在具体编写上以翻译思想自身发展规律为根据,分上、下两部分,上篇为中国传统翻译思想部分,下篇为中国现代翻译思想部分,共八章。除绪论(第一章)外,分别论述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形成(第二章)、转折(第三章)、发展(第四章)、鼎盛(第五章)四个时期和中国现代翻译思想发展时期:(一)中西翻译思想融合时期(第六章)、(二)中国翻译学科建设时期(第七章)、中国当代翻译思想未来发展路径与走向(第八章)。

每一章的结构包括三个组成部分:

(一)概论部分:概述性导读前言。简述该时期社会背景、翻译事业发展概况、主要译论译派及其相关的著名译家;

(二)中心人物论部分:设专节分别详论每个代表人物的翻译思想,以及其作为产生这些翻译思想背景的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翻译生涯;

(三)结语部分:浓缩代表人物的代表性译论精华,贯穿中国翻译思想主线,勾勒翻译思想史的发展脉络。

本书不同于一般“以史料为主”的翻译史和以翻译事件、活动为主的年谱性“编年史”,也不同于一般的翻译理论研究。

本书的特点是以翻译思想为“经”,以人物为“纬”,纵横交错,编织成书。具体来说:

第一,本书以翻译思想为“经”,以中国翻译思想自身发展为轴心,论述其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揭示其特性和共性,评论其科学价值、社会影响,以及对翻译实践的意义。不作纵横比较,不作中外译论系统比较,只设专节论及西方译论对中国翻译思想的影响,但仍保持中国翻译优秀传统独立发展的时间和路线。

第二,本书以人物为“纬”。思想离不开人物,举凡重要的翻译思想都是

翻译家毕生翻译实践之萃，他们是中国翻译界的“东方之子”。研究、总结各个历史时期翻译大家的翻译思想，历史地、辩证地评价肯定他们的功绩和在翻译史上的地位，是书写中国翻译思想发展史的中心部分。本书正文部分专题论述了27位古今杰出翻译家。（叙述过程中旁论的著名翻译家逾半百。）

我国的传统历来都把“载入史册”看得非常严肃慎重，翻译思想史是一种学术史，一个学者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是以学术成果作为内涵的。对其学术成果的评价也就是对学者学术生命的评价，因此，是一件非常严肃的工作。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总要有一种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以学术为本位，以纯学术为标准，排除其他因素（如政治因素、情感因素等）的干扰，做到客观、公允。在过去的翻译思想史上，对周作人、胡适、梁实秋、林语堂、陈西滢、曾虚白一直是有争议的人物，甚至有人把他们对翻译标准的论争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一些文人”掀起的“一股逆流”¹。这是不公平的。通常写历史要保持一定的时间距离。时过境迁，政治因素淡化，学术思想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人们的评价自然也就公正了。本书把这些曾在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学者“载入史册”，有的还设立了专节专论。

在中国现代翻译思想发展时期，我们注重选择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上都作出重要贡献的翻译家，其中把目光投向那些具有学术个性的，有助于现代翻译思想发展的“立说”，尽管也许有争议，甚至认为是“离经叛道”，但却创造了优秀的翻译作品，受到了历史的关注。一般来说，凡有价值的学术思想都是有个性化的，个性的差异正是它得以存在的理由，同时也是学术研究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我们要习惯于接纳各种不同的学术个性，融通各种个性化的学术观点，在竞争中、比较中进入求真、求实的境界，以达到繁荣学术的目的。这也是本书在为学术人物立传，“载入史册”时坚持的一条原则。²

第三，本书遵循“理论联系实际”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将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相结合，将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相统一，并对一些优秀的重要翻译作品进行评论和实践检验，从实证角度印证其理论的正确性。同时我们也看到，他们的代表性译作所具有的穿越时空的永恒魅力。

1 见王澍《翻译标准观评议》（《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年，第116页。）

2 参考何九盈《中国语言学史研究刍议》（《语言科学》2002年，第1期。）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外语教育家蔡毅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俄苏文学翻译家吕绍宗先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梁洁筠女士，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教授、文学翻译家郑海凌先生，北京大学教授、文学翻译家张咏白先生等的热心帮助和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王秉钦



前言二

FOREWORD

聚焦翻译宗师，梳理译论长轴

聚焦翻译宗师，梳理译论长轴，是贯穿中国翻译思想史的一条主线。

写翻译史难，写翻译思想史更难。我深知，治学首在明道。治学的大道，是继续前贤未竟之业，聚沙积薪，继长增高，所谓泽积而长，山积而高，正如站在巨人肩膀上，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牛顿有一句名言：“如果说我看得比别人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

（1676年牛顿写给胡克的信）做学问不可存心以立异为捷径，一味读前人未见之书，治前人不治之学，这样恰如盲人骑瞎马行险道，极易偏离正道常轨。本书正是继续前贤未竟之业。在翻译思想史研究领域做了一些铺路奠基的基础性工作。

一、聚焦翻译宗师：翻译大师是一座高山

历史的中心是人，翻译思想史的中心亦然，是翻译大师。历史人物形形色色，多为各自领域出类拔萃者。历史上能够披沙拣金留下来的人物大都天赋异禀，功力深湛，体大思精，见高识远，常人难以望其项背。加上时空距离遥远，身份差若天渊，研究者大都没有相应的生活阅历，难以体察其行为心境。一位大学者，就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就是一片深藏若虚的海洋。研究者能否领悟到他们在翻译上那些真知灼见背后跃动的创造灵感，能否把握住学者的人生情怀及其所处时代的个性特点，并作出自己的客观描述与阐发？

依稀记得，意大利著名美学大师克罗齐有句名言：“要了解但丁，就必须把自己提升到但丁的水平。”（克罗齐《美学原理》）要了解和评述译学大师的学术思想，则无疑应该需要有与其大致相当的学术根基，然而吾辈后学，与这些大师们在学养上的差距实不可以道里计，因此，要完成此书谈何容易。况且，诚如钱钟书先生所言：“大学问家的学问跟他整个的性情陶融为一片，不仅有丰富的数量，还添上个别的性质，每一个琐细的事实，都在他的心血里沉浸滋养，长了神经脉络，是你所学不会、学不到的。”（钱钟书《谈交友》）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深感此话极有见地。研究者非得下一番精思明辨的学理功夫不可，沉潜书海，寻觅“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思想火花，与大师们产生思想上的共鸣，进行神交。学问之事，要求天赋、勤奋和机缘，三者缺一不可。吾辈自知才疏学浅，只求以勤补拙，尽全力而为之，以达与古今智者贤人心灵上的沟通。

当然，我还深知，对每位大师卷帙浩繁的著作及其思想的了解，还有许多的空白点，这就会使本书留下无法避免的缺憾。只有留给那些占有资料更为详备丰富且用功甚勤的年轻学者，来填补这些空白点吧。

鄙人写学术思想史，还有一好，好将学者生平与其学术思想分离开来，好以今人观念揣度解释古人思想。依我之见，此法也不失为一良法。梁启超曾说过：“平心论之，以今语释古籍，俾人易晓，此法太史公引《尚书》已用之，原不足为病；又人性本不甚相远，他人所能发明者，安在吾必不能，触类比量，固亦不失为一良法。虽然，吾侪慎勿忘格林威尔之格言：‘画我须是我’。吾侪如忠于史者，则断不容以己意丝毫增减古人之妍妍丑，尤不容以名实不相符之解释，致读者起幻蔽，此在百学皆然。”（《先秦政治思想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十）当然，吾辈学习运用，必须循序渐进，不可躐等，还要温故知新，先因后创，守成有余，方能继以创新。

二、梳理译论长轴：中国翻译理论研究需要“学派”的力量

翻译思想史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本书在修订过程中，随着阅读渐广，思考益深，我越来越感到，原来的研究项目框架似乎已不能完全涵盖和容纳思想史所研究的全部范围，要对这个项目有较为深入和系统的描述，反映出它的绚丽多姿，非有足够的容量空间和时间不行，非个人能力所能胜任，研究领域

只有相对集中，论述才能更加深入。此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引导吾辈走上翻译之路的引路人李霁野先生主持南开外语学科期间，以他的学术思想和人格魅力影响和团结了一大批著名翻译家，如查良铮(穆旦)、金隄、朱维之、高殿森、李宜燮、周基堃、臧传真等，论其翻译理论和翻译风格，论其学术实力和在国内译界的学术影响已形成了“南开翻译学派”的第二代核心。

南开翻译学派的第一代领袖人物是柳无忌(柳亚子之子)、梁宗岱、卞之琳、罗大冈。这一翻译学派，数十年来，在大师们的精心培育下，代代相传，后继有人，20世纪80年代，在中青年教师中涌现出了一批有学术个性的英、俄、日语种的翻译学者，并在90年代英语专业设立了招收文学翻译博士生的博士点。这一切标示着南开外语的兴旺发达，也可以说是以李霁野等前辈翻译家为核心的“南开翻译学派”的翻译理论和翻译思想的一种延续。

学说是科学的精华，学派是人才的精华。

科学学派就是一个智力的系统，一个人才的系统，一个科学的自组织系统。共同的学术观点，共同的思想方法，共同的科学理想把一群翻译家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所谓的“无形的学院”(普赖斯语)。翻译流派不是一个“组织概念”，而是一个“理念概念”。有了关于翻译的正确的相同的基本理念或主张，就必然会形成翻译的流派。这对于那些非个体研究所能胜任，需要长时期研究才能完成的巨大科研课题，显得异常重要。只有这样，才能造成一种“集团效应”。

当然，这个系统往往拥有一个既有高深的科学素养又富于科学的组织才能的“帅才”人物作为学术带头人。像古代的墨翟和毕达哥拉斯，近代的牛顿和李比希，现代的玻尔和冯·卡门等等。在他们周围往往云集一大批有才华的学者，为着一个共同的科学理想而奋斗。像以哥本哈根精神为旗帜的玻尔量子论学派，就聚集了当时世界上最有才华的年轻物理学家。1922年至1932年十年间，这个学派先后有十个人荣获诺贝尔奖。

自然科学研究如此，社会科学研究亦然。

中国翻译理论研究，依然需要“学派”力量，需要“集团效应”！

三、梳理译论长轴：深入探索中国现代翻译思想

我们在梳理译论长轴过程中，对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梳理，观点比较一

致，认为坚持以忠实原文为准则，以文本为中心的“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的翻译思想是正确之路。而对中国现代翻译思想的研究则尚未达成共识，翻译界有识之士正在积极探索。在现代翻译思想研究中，我发现中国翻译大家钱钟书、朱光潜、王佐良、季羨林、许渊冲等人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现代翻译观念，可以说，它们都是现代翻译思想的核心概念，颇值得深入研究。约略言之，可有以下诸端：

（一）“灵魂转生”说

钱钟书写道：十九世纪末，德国最大的希腊学家维拉莫威茨（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 1848—1931）在一部悲剧《欧里庇得斯：希波吕托斯¹》（Euripides: Hippolytus）译本的开头，就说过：“真正的翻译是灵魂转生”，将古希腊语原著里的实质换上了德语译本的外形。他所用的比喻“灵魂转生”是我们中国人最熟悉不过的，而且我们知道它可以有形形色色的含义。几千年来，在中国古代小说里所讲的投胎转世和借尸还魂的故事，无奇不有。这种“躯体虽异，精神姿致依然故我”的翻译，就是“灵魂转生”。

诗人翻译家余光中也表述过同样的思想。他说：“真有灵感的译文，像投胎重生的灵魂一般，令人觉得是一种‘再创造’。直译，甚至硬译，死译，充其量只能成为剥制的标本：一根羽毛也不少，可惜是一只死鸟，徒有形貌，没有飞翔。”

“灵魂转生”说，外国也有类似的说法，叫“内在生命对应”。别林斯基在《哈姆莱特·瑞典人的原则》一文中写道：“为了忠实地传达某一形象或语句，在翻译中无论是形象的对应，还是语句的对应，都永远不是字面的对应：应该使译文的内在生命对应于原作的内在生命。”英国诗人爱德华·菲茨杰拉德有一句名言，译者所应当追求的，“宁愿是只活的麻雀，而不是只死鹰”。庞德称诗歌翻译就像“给鬼魂注入血液”译诗就是“让死人复活”，使优秀的

1 相传，希波吕托斯是雅典国王忒修斯和安提俄珀（一说是希波吕忒）的儿子。他的后母淮德拉狂热地追求他。遭到拒绝后，她怀恨在心，在他父亲面前极力诬陷他，他父亲听信谗言便请海神波塞冬来惩罚他。当希波吕托斯乘马车沿着海岸奔驰时，突然海神波塞冬打发一头牛出海吓唬驾车的马匹，于是马惊车覆，他当场毙命。后来，他被能起死回生的神医阿斯克勒庇俄斯救活，并被带到意大利，用维耳比乌斯的名字开始新的生活，成为意大利英雄。在雅典，人们对他敬奉如神。关于希波吕托斯的神话一直成为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0~406）、塞内加的悲剧创作题材，在近代则成为拉辛的悲剧和拉莫的歌剧的内容。这段神话故事可以帮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真正的翻译是灵魂转生”的涵义。

文学传统再生，是一种“文学复兴”。

“灵魂转生”说与西方现代最流行的解构主义学说进行对话就更和谐。解构主义宣称原作者“死亡”，翻译是文本的“重生”，“文本因经过翻译而被赋予新的意义，并获得新的生命”。这种“死亡”与“重生”的说法，与“灵魂转生”说似乎是完全一致的，甚至可以说，是“灵魂转生”说法的翻版。不错，“灵魂转生”说最早是德国著名希腊学家维拉莫威茨提出来的，但经过中外大师，如钱钟书、爱德华·菲茨杰拉德等人的解读和发展已经成为成熟的东西方翻译理论共同认可的“核心概念”了。“真正的翻译是灵魂转生”。这已成为中外翻译学者的共识。

（二）“译者个性”说

近百年来，我国传统翻译观念一直认为，翻译就是忠实地传达原作的内容和形式，“要把原作的内容确切地完全表达出来，无改变或歪曲的现象，无增添或删除的现象，无遗漏或阉割的现象”。这就是说，由于翻译受制于原文，就必须泯灭译者的主体意识，否定译者的创造个性。一句话，译者应充当“隐形人”，彻底“隐身”，要做到感觉不到译者的存在，完全忽略了译者客观存在的介入行为。

然而，“文学和艺术作品毕竟不是科学，而是触及‘灵魂’的东西，这里面有‘朦胧’和‘似与不似之间’的成分，要用像数学那样精确的形式表达出来是不可能的。这里有一个‘再解释’的过程。译者在‘揣度’的过程中，就受到他本人的人生修养、文化和政治水平、艺术欣赏趣味以及他对作者及其时代背景的知识等因素的限制。因此，译者的个人因素在翻译工作中所起的作用，是决不能忽视的。”（叶君健《翻译也要出“精品”》）

叶君健特别强调“译者的个性”作用和创造“个性的译作”的思想。特别是在他晚年，这一翻译思想已经达到了成熟的境界。他说：“单凭‘信、达、雅’恐怕还不够，我们需要具有个性的译作。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在另一种文字中具有特色，要看它的译文是否有个性。”“一部译作有没有生命力，主要取决于译者有没有个性。”“一部有‘个性的译作’它是译者的心血、思想感情、文字和艺术修养的总和。”从而，创造了“译者个性”说。

过去，在传统翻译观念，即“信、达、雅”翻译思想一统天下的时代，对“译者个性”是翻译作品生命的思想，缺乏深刻的认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思